

赵一曼与陈达邦：漫漫革命路 寸寸赤子心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这封抗日英雄赵一曼留给儿子的绝笔信，曾感动无数国人。然而鲜有人知晓，她的丈夫陈达邦同样是一位革命者。两人短暂却绚烂的爱情故事，折射出先驱们在理想、爱情与牺牲之间的艰难抉择与无私奉献。

远航之缘

1927年9月的上海外滩，一艘开往苏联的商船即将启航，甲板上站着40多名被党组织选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的青年党员。这其中，就有刚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历经艰险与组织接上关系的四川姑娘李淑宁。

望着外滩彰显着殖民色彩的异国建筑，她心中没有离乡的伤感，只有炽热的期盼：“什么时候，我们的人民才能过上独立自主的新生活？”

船只驶入茫茫大海，剧烈的颠簸让从未经历过远洋航行的李淑宁深受晕船之苦。她整日伏在船舷呕吐不止，甚至虚弱脱水。就在这艰难时刻，身为李淑宁所在小组组长的陈达邦挺身而出。这位来自湖南、时年27岁的青年，早在1926年便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并于次年入党，经党组织派

遣赴苏学习。他沉稳细致，随身携带着药品，看到组内这位坚强的女同志备受晕船折磨，主动担负起照顾之责。

陈达邦拿出晕船药，在李淑宁呕吐间隙耐心劝她服下；他端来饭菜，像哄孩子般劝说她吃一点；他陪她聊天，用共同的革命理想转移她对身体不适的注意。在浩瀚的大海上，两个怀揣救国理想的年轻人逐渐靠近。

李淑宁了解到，陈达邦虽出身湖南长沙较为富足的家庭，却毅然投身革命，其妹陈琮英更是嫁给了党的早期领导人任弼时。相似的家庭背景与革命选择，让两人有了深谈的基础。李淑宁开始注意到这个“儒雅俊朗，为人热情诚恳”的同伴，心中漾起“莫名其妙的好感”。而陈达邦也对这位独自闯荡、追求理想的四川姑娘充满敬意与怜惜。

航程漫漫，两人的感情在克制与吸引间微妙变化。李淑宁一度试图回避这悄然萌芽的情愫，专注于思考肩负的学习使命。但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总有一种“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理不清，剪还乱”的情愫。

陈达邦还是一如既往地对李淑宁十分尊重和热情。他们的感情一点一点地沉淀和升华，但两

个人都没有揭开心底的秘密，只是心照不宣……

莫斯科之恋

抵达莫斯科后，李淑宁与陈达邦一同进入中山大学。李淑宁的中文名字改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

学习生活新鲜而充满挑战，语言关是首要挑战。毫无俄语基础的李一超学习极为吃力，常常独自埋头苦读。而陈达邦总能在图书馆或校园角落“偶然”找到她，他自然地上前为其辅导俄语，或邀她散步放松。他也会在她废寝忘食时默默递上饭菜，那份无言的关怀在异国寒冬中显得格外温暖。

尽管李一超试图以革命、学业为重，继续“收缩那颗刚刚打开的女儿心”，但她发现，陈达邦的身影已挥之不去。经过一番内心挣扎，她决定与陈达邦坦诚交谈。在校园里的桂花树下，两人敞开心扉。陈达邦以赤诚之言化解了她的顾虑：“学习、工作、爱情是人生必须要经历的……只要我们把爱情和学习的关系处理好了，就会有动力，就会学习爱情两不误。”这番话让李一超放下了思想包袱，接受了这份在革命征程中绽放的爱情。

1928年4月，在同学们的祝福声中，两人在莫斯科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结为革命伴侣。

不久，李一超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学业未成，国内革命形势又亟需干部。李一超经过痛苦思考，做出了一个影响两人一生的决定：她向组织申请先回国，既生下孩子，也可投身国内斗争。陈达邦强烈反对，希望等她生产后一同回国，彼此有个照应。但李一超态度坚决：“党派我们到苏联来，是来学习的，不能让我们俩都头脑

空空地回去。”她向丈夫保证：“等你回国后，我一定把长得白白胖胖的孩子交到你手上。”

临别之际，陈达邦将贴身的银壳怀表和金戒指送给妻子，以备不时之需。李一超则叮嘱丈夫安心学习。在红场列宁墓前默默告别后，1928年秋，李一超与其他四位同志踏上归程。她不曾想到，这一别竟是与丈夫的永诀。

生死两茫茫

回国后，根据革命需要，李一超辗转各地工作，并于1929年初在湖北宜昌生下儿子，乳名“宁儿”。为便于从事工作，她将宁儿托付给陈达邦的五哥陈岳云夫妇抚养。此后，她化名赵一曼，奔赴东北抗日战场，成为一名巾帼英雄。1935年，赵一曼受伤被俘，次年英勇就义。

而陈达邦在莫斯科完成学业后，受党组织派遣，先后在莫斯科负责党的印刷业务，又于1935年前往法国巴黎，任《救国时报》印刷部主任，为抗日宣传呕心沥血。1938年后，他在巴黎等待新任务长达四年，1942年才辗转回到重庆。由于战时信息隔绝与地下工作的保密性，陈达邦对妻子的情况一无所知，更不知“赵一曼”就是李一超。

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上映，她的英雄事迹传遍神州，但赵一曼的真实身份成谜。1955年，赵一曼的姐姐李坤杰通过多方查证，终于确认赵一曼即是李一超，并写信告知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当陈达邦得知离散二十多年的妻子竟是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且早已牺牲时，内心百感交集，悲怆难言。

当时，陈达邦因其印刷专长，被调至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民币印刷工作，并赴苏联处理代印人民币事宜，他题写的人民币汉字字体沿用数十年。1966年，陈达邦离开了人世。据《老年文汇报》

三位太后是苏轼的贵人

宋代苏轼能成为文化巨擘，除了自身才华，也得益于贵人相助，其中三位太后对他有重要影响。

曹太后是北宋开国名将曹彬的孙女，宋仁宗皇后。仁宗无子，英宗即位后四年去世，神宗继位，曹太后成为太皇太后。“乌台诗案”时，苏轼身陷囹圄，多人营救，曹太后是关键人物。她在病中向神宗提及仁宗对苏轼兄弟的赞赏，认为苏轼入狱可能是仇人中伤，还表示自己病重，不可因冤滥伤中和之气，应慎重处理。后来神宗准备大赦天下为祖母祛病，曹太后却说只需放了苏轼。

高太后出身名门，是曹太后的亲外甥女，与英宗青梅竹马。她听政九年，朝廷清明，人称“女中尧舜”。高太后听政后废除新法，召回旧臣，苏轼也备受器重，官职不断晋升。朝中党争激烈，苏轼常遭攻击，高太后总是赦其无罪，还抚慰他安心勿恤人言。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苏轼失去“守护神”，先被贬定州，再被贬惠州，直至海南。

哲宗24岁去世，向太后听政6个月，在听政第二月推动大赦天下，苏轼得以离开海南。可以说，向太后让苏轼免于终老海岛的命运。

刘江滨/文

